

魏了翁寿词创作考源

张帆

(西华大学 人文学院, 成都 610039)

摘要:魏了翁寿词创作之多,堪称中国词人之首。对此,前人颇有微词。魏了翁寿词创作的源头与中国浓厚的礼仪文化积淀、宋代理学思想的兴起以及先秦儒家就倡导的“和而不流”的君子风范息息相关,而这些复杂而深刻的原因正是我们解读魏了翁寿词必不可少的重要门径。

关键词:魏了翁;寿词;考源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9)04-0101-04

魏了翁是南宋蜀中著名词人,现存词186首,但多数为寿词、次韵、和韵等应酬之作。尤其是寿词之多,堪称中国词人之首。对此,前人颇不以为然,李调元《雨村词话》卷三云:“宣和而后,士大夫争为献寿之词,连篇累牍,无谓极矣。吾蜀魏了翁华甫为宋名臣,乃词非寿不作,虽《花庵》选入数首,吾终不敢取。”^{[1]1425}吴衡照《莲子居词话》卷三亦云:“生日献词,盛于宋时。以谀佞之笔,拦入风雅,不幸而传,岂不倒却文章架子。……至如魏华父则非此不作,不可解已。”^{[1]2449}前人的说法,的确值得我们深思。作为一代理学大师的魏了翁,为何乐于此道?其价值虽见仁见智,却历经千年得以流传,其意义何在?笔者试图对魏了翁寿词创作作一个探源性审视,探讨它与传统的寿祝文化、宋代理学思想以及魏了翁“君子和而不流”人格风范的关系,进而给魏了翁寿词创作一个相对客观公正的评价。

一 传统礼仪文化与寿祝文学的演变

渴求生命的永恒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自觉意识。早在《山海经》中就有上古之人长寿的神话,这些神话本质上是原始初民们渴望超越死亡、追求长生的艺术表现,随着人类理性生命观的逐渐形成和渴求

生命永恒的主观愿望的激烈碰撞,祭天法祖,祈求福寿的人生仪礼也就逐渐兴起。先秦时期的祝寿风俗就被纳入“礼”的规范,属于吉、凶、宾、军、嘉“五礼”中嘉礼的范畴,寿祝文学创作也随之而萌生。《诗经》就频频出现祈福延寿的祝语和绘声绘色描写祝寿保祚的场面。如《小雅·楚茨》中的“孝孙有庆,报以介福,万寿无边”,《周颂·载见》中的“以孝以享,以介眉寿,永言保之,思皇多祜”,以及《商颂·烈祖》、《大雅·既醉》等等都在祭祀庆典中贯穿着祈求祖先赐福赐寿的内容。此后,统治者更是大兴祝寿庆典,寿诗也就配合着专用乐歌而不断发展。宋代郭茂倩所编的《乐府诗集》中保存着大量汉魏六朝的上寿乐歌。如傅玄为晋武帝所作的《上寿酒歌》、张华的《王公上寿诗》、成公绥的《王公上寿酒歌》等等,都是为帝王所作的寿诗。《新唐书·礼乐志》载,唐代也有向圣上献寿诗乐歌的习俗:“千秋节者,玄宗以八月五日生,因以其日名节,而君臣共为荒乐,当时流俗多传其事以为盛。……自肃宗以后,皆以生日为节,而德宗不立节,然止于群臣称觞上寿而已。”^{[2]477}唐代不仅出现了像《万岁长生乐》、《大献寿》、《万年欢》那样专为帝王祝寿而表演的大型乐

收稿日期:2008-08-07

基金项目:本文系四川省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资助项目《魏了翁寿词》(项目编号:w 07207019)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帆(1956—),女,重庆市涪陵区人,西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副院长。

舞,而且出现了配合祝寿乐曲演唱的歌辞。张说《舞马千秋万岁乐府词》3首、李白《上云乐》、杨巨源《春日奉献圣寿无疆词》10首、张仲素《献寿词》等等,都是帝王祝寿颂德而作。其盛况正如王涯《九月九日勤政楼下观百僚献寿》所绘:“年年歌舞度,此地庆皇休。”

从总的来看,唐宋以前的寿体文学创作,多是臣民为君主祈福祈寿的礼仪活动的产物,它们在本质上反映了臣子忠君颂圣的伦理思想。但唐朝与前代的寿体文学创作相比,有两点明显的变化对宋代寿词创作影响深远:一是寿体文学创作已有了民间寿亲寿友的内容,如杜甫《宗武生日》、李郢《为妻作生日寄意》等就是典型的寿亲诗;二是用于祝贺寿辰的词体创作也开始出现,敦煌曲词《感皇恩》中就有“叫呼万岁愿千秋”、“从此后,愿皇帝寿如山”的内容,是寿乐寿歌由诗向词的延伸。

两宋祝寿的风俗之盛是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难以企及的,不仅寿诗盛行,用于祝寿祈福的寿词创作也成了一种新的词学现象。北宋创作寿词的词家约30余家,词作约为180余首。北宋的晏殊,《全宋词》收录其词135首,寿词有28首。而南宋寿词,据《全宋词》和《全宋词补辑》粗略统计,约为2347首,占宋词总数约1/10,涉及寿词创作有姓名可考的词家约400人,如南渡时期的曹勋存词183首,寿词有29首;南宋沈瀛存词99首,寿词有53首;廖行之存词41首,寿词有21首。其中魏了翁更以101首寿词而位居众家之首^①,成了南宋寿体文学创作最突出的典型。

二 南宋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与寿祝文学的繁荣

偏安一隅的南宋王朝不仅不思收复中原,反而在屈辱的“隆兴和议”后凭借江南富庶的物产和长江屏障,沉醉于文恬武嬉的侈糜中。而词本来就是一种和乐可以演唱,“文乐相表里”的艺术形式。本着《乐记》“乐与政通”的传统和“礼以节外,乐以和内”的精神,南宋统治者于绍兴十二年开天下乐禁,其盛况恰如铜阳居士《复雅歌词序略》所描述:“属靖康之变,天下不闻和乐之音者,一十有六年。绍兴壬戌,诞敷诏音,弛天下乐禁。黎民欢忭,始知有生之快,讴歌载道,遂为化国。”^[3]可见这一举措的确有“以乐干政”的社会效果。它既是统治者的政治需要,又满足了南宋人世俗生活的需要。与前代相比,南宋的

宫廷祝寿活动也更加频繁,几乎每个皇帝都以自己的诞辰命名一个“圣节”。《东京梦华录》卷九记载,每到这一天,宫中都要举行盛大的祝寿庆典,朝臣上殿祝寿,乐工歌妓致语奏乐,歌舞相庆。这种圣节祝寿之风至孝宗乾道、淳熙达到高潮,直到理宗、度宗朝依然盛行。周密在《武林旧事》中称:“寿皇圣孝,冠绝古今,承颜两宫,以天下养,一时盛事,莫大于庆寿之典。”^[4]卷1上行下效,《齐东野语》“贾相寿词”条载:“贾师宪当国日,……每岁八月八日生辰,四方善颂者以数千计。”^[5]卷12.219文人为权贵献寿词以助兴添雅,固然有其功利目的。但总的说来,不管是朝廷的祝寿颂德,还是民间的寿诞礼仪都是一种以封建伦常观念为思想根柢、以喜庆祥和为基调的风俗行为,本质上贯穿着中国传统文化尊亲贵老的伦理精神,也是传统儒学和宋代新理学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魏了翁不是单纯的文学家和词人,他一生的主要贡献,是经其努力倡导,使理学在遭受“伪学之禁”以后,取得了正统的学术思想地位,而他的这些活动以及他所倡导的理学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又为寿祝文学的兴盛推波助澜。

魏了翁成年入仕时,正是理学遭受打击,被定为“伪学”、严令禁止的时期。而年轻的魏了翁在临安结识了朱熹的门人辅广、李方子等著名学者后,便开始读朱子书,在《答朱择善改之》中他总结这段求学的体会:“某少时喜记问词章,所以无书不记。甲子、乙丑年间,与辅汉卿、李公晦邂逅于都城,即招二公子时同看朱子诸书。只数月间,便觉记览词章皆不足以为学。”^[6]卷35自此以后,魏了翁便开始系统研究朱熹思想,并以推崇理学、树立理学权威为己任。最突出的事迹表现为:大力赞颂朱熹,在《朱文公年谱序》中称之为“集濂、洛之大成”的学者,“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不仅将朱熹理学著作刊之于蜀,还在家乡蒲江创建了著名的鹤山书院,开门传授程朱理学,使当时四川的读书人“争负笈从之。由是蜀人尽知义理之学”^[7]卷437.12966。其次是他坚持不懈地要求统治者“为理学祖师爷周敦颐、程颢、程颐赐爵进谥”。嘉定九年(1216),他上疏宋宁宗《奏乞为周濂溪赐谥》。嘉定十年(1217)春正月,魏了翁又再次上疏《奏乞早定周程三先生谥议》申述前奏,并将其上升为关系到“学术之标准,风俗之枢机”的大事^[6]卷15,言辞十分激切感人:“臣愚欲望圣慈申饬有司,速加

考订,俾隆名美溢,早有以风励四方,示学士趋向之的,则其于崇化善俗之道,无以急于此者。”^{[6]卷15} 因为魏了翁的一再奏请,加之一些朝臣如真德秀等人的有力支持,嘉定十三年(1220)宁宗准其奏,并向全国褒扬了周、程开创理学的功绩。以此为契机,崇尚理学之风很快在全国各地兴起,各州郡纷纷为周、程等理学家建立祠堂,魏了翁也应各州郡之邀,为各处的周、程祠堂作记,大张理学旗帜。自此以后,以理学形态出现的新儒学,不仅成为南宋后期在意识形态中居于支配地位的官方哲学,也一直为后世的统治阶级所尊崇。这显然与魏了翁等人的努力倡导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它自身的理论价值在于弘扬古代儒家精神,将它置于封建社会思想界至高无上的位置,也是统治者稳定社会的政治需要。

南宋是一个社会动乱、朝野逸乐成风的时代,但因程朱理学的日益兴盛,同时又是一个封建伦理空前强化的特殊时代。理宗在宝庆三年(1227)下诏时说:“朕观朱熹集注《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发挥圣贤蕴奥,有补治道。”^{[7]卷41} 可见统治者已充分意识到用理学思想来教化世道、凝聚人心、巩固皇权的重要性。虽然“道”的内涵十分丰富,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无疑是封建道德的核心,它将整个封建社会的关系等级化。而寿祝仪礼和寿体文学创作也正是在其乐融融的氛围中将这种上下等级观念变得轻松自然,成了统治阶级驯化百姓、加强孝道宣传和建立和谐社会的重要媒介。因此,就皇家统治而言,从南渡后的宫廷寿祝活动,到理宗、度宗朝依然盛行。就士大夫阶层而言,南宋是一个以文官为主体的封建官僚社会,在统治阶级和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士大夫特别注重“立德”的人生价值。“德”的含义自然也十分深厚,除了严守君臣等级尊严之外,朋友、同僚以及家族的和睦与否,不仅直接关系着社会的安定,也直接体现着士大夫本人的道德规范。从这一点上看,铺张侈糜的寿祝活动虽有享乐的性质,也同时具有弘扬理学孝悌仁爱的深刻用意。而且它所带有的人伦情调和日常性的情感体验更容易被社会各阶层认同并接受。尤其是社会各阶层的寿亲、寿友活动和与之相连的寿词创作,自然就成了许多文人乐于参与的既世俗又高雅的交际活动。刘辰翁《鹤桥仙》云“人间乐事有多般,算此乐、人间第一”,就概括了很多文人的共同心态。因此,当时许多优秀词人如张元干、刘克庄、辛弃疾等都不自觉地汇入

这支创作大军并成了其中的佼佼者,而作为南宋理学大儒的魏了翁,在倡导理学精神的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加入了寿词创作的行列,并把它推向了高潮,也自然是合乎情理的历史事实了。

三 “和而不流”的君子风范与魏了翁寿词创作

魏了翁为官直言敢谏,《宋史》本传载:“庆元五年,登进士第,时方讳言道学,了翁策及之。”“韩侂胄用事,谋开边以自固,遍国中忧骇而不敢言”,而魏了翁则大胆进言,以至于“策出,众大惊”^{[7]卷437,12965}。直道立朝的魏了翁,不屑与权奸为伍,也是史学家称道的品质。《宋史》本传又载:后韩侂胄以误国诛,“朝廷收召诸贤,了翁预焉,会史弥远入相专国事,了翁察其所为,力辞召命,丁生父忧,解官心丧,筑室白鹤山下……”^{[7]卷437,12965} 可见,不与世沉浮是魏了翁为官的原则,也是其人格魅力所在。但另一方面,作为一代大儒的魏了翁既然努力倡导理学的权威,先秦儒家所积极倡导的“君子和而不流”^[8]的人格精神,温柔敦厚的人生素养,更是他身体力行的理学风范,这也无形中为他提供了大量寿词创作的机会。

首先是广泛的学术活动和不囿于门户之限的交游。与魏了翁同时代的理学人物,大都为朱熹、陆九渊两家的后学弟子,他们基本上是各自墨守师说,相互排斥诋毁。就连与魏了翁齐名的理学大师真德秀,也是严守朱熹门户。魏了翁对此则表现出平和、友善的气度。他不但与朱熹后学辅广、李方子、度正、曹彦约等人交往密切,与陆九渊后学陆持之、叶元老、袁甫等人也有密切的联系与学术交往。加之魏了翁一生乐于会友,早在他26岁担任学官时,就“获四方之士而取师友”。在四川做官期间,所到之处积极从事讲学活动,广结天下文士。再加上他曾分别在四川蒲江和当时的荆湖北路的靖州(今属湖南)创办了两所著名的鹤山书院,授徒讲学著述,交游甚众。与巴蜀及川籍学者如李心传、度正、范荪、宇文绍节、张忠恕、虞刚简、刘光祖、李从周等人相互论学与交往^[9]。交游广自然唱酬无数,用心地交际、用心地应酬乃至寿祝题材创作的数量之多也就不难理解。在其词作中我们随处可以读到他与这些朋友唱和的寿词。如《刘左史光祖生日(念奴娇)^②》、《杨崇庆熹生日(水调歌头)》、《孙靖州应龙生日八月八日(木兰花慢)》、《赵运判师奶生日(水调歌头)》、《靖州江通判珙生日(鹧鸪天)》、《李参政壁生日十一月二十四日(水调歌头)》、《生日谢寄居见任官载酒三

十七岁(木兰花慢)》、《吴制置猎生日(水调歌头)》、《李参政壁生日(满江红)》、《邓侔子美生日(虞美人)》等等,多不胜数。

其次是孝悌仁爱的理学精神,也是“君子和而不流”本质的延伸。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宗法社会,家族是社会的组成单元,更是凝聚个人的轴心。社会是君臣及各阶级、阶层组成的网络,家庭则是父子、母子、夫妇、兄弟等复杂的血缘关系彼此联结的单元。孝悌仁爱既是家庭中必不可少的道德规范,也是传统儒家和南宋新理学努力倡导的社会风范,寿亲、寿友活动自然就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在魏了翁101首寿词中基本没有寿君词,也很少对高官贵胄刻意的谀美,但有大量的寿亲词,从这些寿亲词中我们不难看到理学家所追求的家族的和谐与亲情体验。如魏了翁寿词中单是与“叔母”寿诞有关的词就有20余首之多,所谓“叔母”,其实是魏了翁的生母。魏了翁的父亲魏士行和高孝璠本是亲兄弟,同属魏家。因祖母高氏之兄高黄中无子,便将孝璠过继高家。高孝璠之妻谯氏生六子,魏了翁排行第五,过继魏家为后,故称生母为“叔母”。在魏了翁为生母而作的寿词中,除为数不多的为母亲祈福祝寿外,更多的是记载母亲生日时家族和朋友的聚会。如《叔母生日同家人劝酒(水调歌头)》、《即席次韵张太傅方为叔母生日赋(南柯子)》、《叔母生日同官载酒用去

年词韵(小重山)》等。还有不少借母亲生日抒发自己生命蹉跎,愧对时光、愧对母亲的情怀。如《叔母生日(水调歌头)》云:“人道三十九,岁暮日斜时。儿今如许,才觉三十九年非。”这些词虽非都是佳作,但从中可见作为理学家的魏了翁对生母的礼数与赤子之心的交织,更可知传统儒家的孝道文化精神,是如何深入到士大夫阶层的道德理念中。正如朱熹所说:“文皆是从道中流出”^{[10]卷139},“有那情性,方有那词气声音”^{[10]卷25}。虽然这些因祝寿氛围而创作的寿词不免对同仁、亲友称诩夸耀,有客套与溢美之嫌,被后人视为千篇一律而没有价值。实际上它们是有价值的,它至少从一个侧面表现了魏了翁“和而不流”的人际交往和孝悌仁爱的人伦情调,而具有了史料与文学并存的价值。

综上所述,魏了翁的寿词不是纯粹的艺术活动,它是长期的寿祝礼仪的文化积淀、南宋盛行祝寿庆生的风俗行为等诸因素的催生下产生的特殊语言;也是他本人大力倡导“立本”、“厚伦”,“以化善俗为治”^{[7]卷437,12966}的政治主张和“君子和而不流”的理学风范本质外化的产物;反过来,他大量的寿词也传承着一种古老的民族礼仪文化,记录着他践行理学风范的实情,这似乎可以视为魏了翁寿词创作虽为人不屑却承传至今的价值所在。

注释:

- ①据张文利《鹤山寿词考述》的最新统计,见《文学遗产》2006年5期,第137页。
②魏了翁词以事标题而不标调名,《全宋词》调名为唐圭璋据紫芝漫钞本《鹤山长短句》所补并校正。

参考文献:

- [1]唐圭璋.词话丛编[G].北京:中华书局,1986.
[2]欧阳修,等.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7.
[3]桐阳居士.复雅歌词序略[G]//施蛰存(主编).词籍序跋萃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4]周密.武林旧事[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
[5]周密.齐东野语[M].张茂鹏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
[6]魏了翁.鹤山集[G]//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7]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8]礼记·中庸[G]//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2.
[9]彭东焕.魏了翁年谱[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
[10]朱子语类[M].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4.

[责任编辑:唐 普]